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人文社会的分化

虞和平

作者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以进一步奴化中国人民、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侵略,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半殖民地化、买办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的分化,并造就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而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造成这一侵略者始料不及的后果的重要原因,一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与输入,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动机与选择标准;二是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构成与内容中既包括奴化、教化方面,也包含着许多科学技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革命历史以及实用性知识。即使作为主要传播内容的基督教也是经过改革后的新教,而新教的崛起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起到了某些决定性的作用。至于新教传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虞和平,男,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在强行给中国注入资本主义文化机构和文化内容的同时,又促使中国传统的文化机构、文化内容和文化人发生变化,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由原先的单一传统结构转变为新旧兼有的二元结构。初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临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它在给中国输入新文化素质时,不能不利用中国社会中可资利用的一切因素,以图扎根和扩展。这一利用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视为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半殖民地化和买办化的具体表现,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的分化和初步现代化过程。

一、西方人文社会模式的楔入与中国人文社会模式的分化

外国传教士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获得在华自由传教的权利后,他们伙同各类来华外人,在传播外国宗教和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陆续传入中国,并为此设立各种文化传播机构,将西方的资本主义人文社会模式楔入中国。

传教士等来华外人所设立的第一种文化传播机构是西书译编和出版机构。从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起,到清末时,由传教士设立的译编和出版机构达60家左右。

这些机构大多具西方同类机构的特点。在组织模式上,或采用公司制,或采用会社制,规模较大者还实行股份制,设立类似于董事会的管理部门。其最典型者当属1887年设立的同文书会(1892年改称广学会),它由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商人、海关和外交官员等39人联合发起,由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任总理。次年成立董事会,以赫德为会长、德国

驻上海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为督办。^①其他机构亦程度不同地采用类似的组织模式。^②

在经营管理上,大多具有比较健全而明确的分工,设有行政领导、翻译编辑、印刷和发行等部门或专职人员。各机构一般多由主办教会委派行政领导者,或由联合发起者组成董事会,负责机构的全面领导工作;再由行政领导者聘请翻译和编辑人员,专事译编工作;有的机构自设印刷所和发行部,亦均聘专人负责。

不少机构所设的印刷厂所,逐步引进西方的印刷机械和铅印、石印技术。如墨海书馆一开始就采用牛力印刷机和铅印设备,并将石印技术传入中国。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于1844年在澳门创办,次年迁宁波,1860年再迁上海的美华书馆,下设工人达百余名的大型印刷厂,不仅采用机械和铅字印刷,而且先后发明电铸铜模字(电镀字模)、排字架等新技术。^③由英国商人美查于1879年创办的点石斋石印书局,设有当时规模最大的石印工厂,并采用手摇轮转石印机,^④开启了印刷业的又一个新阶段。

传教士等来华外人所设立的第二种文化传播机构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鸦片战争之后,来华外人的办报活动急剧扩展,到19世纪末,累计创办报刊约达200种,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⑤这些来华外人所办的报刊,大多采用了西方报刊的组织和经营模式。

首先,在资金筹措上,采用个人出资、合伙集资和招股集资的方式。王韬说:“迩来西人在中土通商口岸创设日报馆,其资皆出自西人”。创办较早、规模较小的报刊,一般由创办者个人出资和教会资助;创办较晚、规模较大的报刊,则多以合伙和招股集资为主。如《万国公报》,“出资者多教士”,即由传教士集资创办;1872年开设的《申报》,由英国商人美查、伍华德、普来亚和麦基洛4人合资发起,1888年“添招外股”,改为股份公司;1886年创办的天津《时报》,其资本由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怡和洋行总理笏臣集股而得;1893年在上海开设的《新闻报》,由中外商人合资创办,1906年改组为公司。^⑥

其次,在经营体制上采用渐趋完善的公司制,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大多数报刊都设有总理、主笔、编辑、记者、印刷和发行等人员和部门,各有专责,运行有序。有些大型报刊还设立董事会,作为最高的领导机关。如《新闻报》在20世纪初已形成健全的公司制体系,以董事会为最高领导机关,下设总理处,再下设编辑、营业、印刷三部,各部之下设各种业务科,有些科下还设立股。^⑦在财务上大多实行独立核算制度,追求利润。纯粹由教会补贴,不计成本的报刊,为数极少。

再次,在刊载内容和版式上采用西方报刊的模式。许多报刊虽由教会和传教士主办,但其所刊载的内容不仅限宗教方面,还包括新闻、科学、政论、历史等方面。如由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创办的第一家华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述其旨趣说:“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均在采择之列。^⑧一些非教派所办报刊,更是内容广

① 韦廉臣,《同文书会实录》,《万国公报》第14次,1890年3月版。

② 参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

③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卷,上海书店1953年版,第259—260页。

④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69—270、272、265页。

⑤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⑥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86、59、64、65页。

⑦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8—199、164—165页。

⑧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7页。

泛。在版式上,逐渐由书本式向大张纸式转变,排版也渐趋艺术化和灵活化。至于印刷上,则多取铅印。

传教士和来华外人所设立的第三种文化传播机构是教育机构。开办各种学校是来华外人最主要教育活动,从1842年马礼逊和米怜将英华书馆从马六甲迁至香港开始,到1914年教会学校总数已达12177所,在校学生数达245684名。^① 他们的办学活动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模式展开的。其表现之一是按照西方的学校建制分类,建立各种等级和类别的学校。在1860年之前的初创阶段,以创办小学为主;1861—1876年的初步发展时期,开始建立少数中学;1877年之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小学、中学数迅速增加,而且逐渐发展科技、医学、师范等专科学校,大学也开始出现。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校建制体系。

其表现之二是采用西式的管理体制。1881年,传教士林乐知发起的中西书院,“所定学中规矩悉照泰西之法”。^② 如果说在教会学校的初创阶段,由于学校的规模较小,这种西式管理体制尚不普遍、不健全的话,那么进入发展阶段之后,尤其是在各种专科学校、大学和大型中学中,这种西式管理体制渐趋明显和健全,大多采用董事会和监理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育设施渐趋完善,图书馆室、实验室、学生娱乐场所和宿舍逐步建立起来。学生大多实行住宿制,按照严格的作息制度进行学习和生活。^③

其表现之三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中西并用,逐渐西化。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学校都设有儒学、宗教学、理化学、政法学、音乐学、史地学和外语等方面的课程,除儒学纯属中学外,其他多属西学。在教会办学的初创阶段,儒学和宗教学的课程较多,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逐渐增多,尤其在专科学校和大学中,大多以西学为主。在教学方式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教学的单纯跟诵死背方式,开始结合课文的讲解;而且随着校办实验室、博物馆、实习工场的开设,使书本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抽象教学与形象教育相结合。

上述传教士和其他来华外人所设立的三种主要文化传播机构,大多数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机构的基本特性。它们不仅给传统的中国人文社会注入了异质的西方人文社会模式和因素,而且随着它们的功效的显示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进展,逐渐被中国有识之士视为仿效的样板,使中国官方和民间模仿或聘请外国文化传播者创办自己的新式译编出版机构、新式报刊和新式学校的活动逐渐兴起。这从时人的有关论述中可见一斑:1887年《申报》评述中国石印出版业的发展过程说:“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④ 郑观应在呼吁中国自办报刊时指出:“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⑤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时,叙述中国自办新式学堂事说:“洎乎中外互市以来,华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学之流进中国者已非朝夕。识时务者,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学之足扩襟怀。一再仿行,因设同文、方言之馆;次第举办,乃兴武备、水师之堂。然此特国家仿效西法之一端”,格致书院之设则可谓民间仿效西法之又一端。^⑥ 至于中国官民仿西法创办新式文化传播机构的具体事例,则比比皆是,无需枚举。

① James W. Bashfor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The Abingdon Press, New York Cineimati, 1916, 第113—114页。

② 林乐知:《设立中西书院启》,《万国公报》(早期)第657次,1881年7月版。

③ 参见〔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46—52页。

④ 委宛书编:《秘探石室》,《申报》1887年2月5日。

⑤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6—347页。

⑥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

二、外国文化机构的中国雇员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分化

来华外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不仅有人生地疏之感,而且有语言不通之障碍,甚至还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因此,聘用中国文人协助其传播西方文化工作,是他们的普遍做法。

在书籍译编和出版机构中,有不少华人参与其事。首先,这些机构的设立和日常工作都有华人参加。墨海书馆早在1849年就聘请王韬担任中文编辑,并参与译书之事,为时达13年之久。广学会中有助译及誊录发行的华人18人,著名者先后有蔡尔康、任保罗、范百海、许东来等人。上海圣教书会由顾泳经、吴虹玉、鲍华甫等华人共同参与发起。青年会书报部的主持人大都是中国人,先有谢洪资、奚伯绥、胡貽毅、范百海等人,后有谢扶雅、应元通、沈体兰、张仕章、吴耀宗等人。其他的教会翻译和出版机构,也大都聘用数量不等的华人。

其次,有些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中国人士的资助。以广学会为例,“其捐资帮刻成书者,有各海国西国官商善士,倘蒙中国各直省督宪大人倡首募捐,以及司道大宪、官绅商贾代为广劝,俾得集资添刻各书。”^①如张之洞为李提摩太所译名著之一的《泰西新史揽要》的出版资助1600元,后来在1894—1902年间又四次向广学会捐款达9000元之多。^②聂缉槩不仅捐款资助该书出版,而且购书百部分送同僚,调任浙江巡抚后,又向广学会捐款千元。并劝本省官绅每年向广学会订购不少书报,几乎成了广学会的义务推销员。

再次,许多书籍的翻译是由中国人代笔而完成的。传教士出于语言困难,在翻译西书时往往聘请中国文人合作。由洋教士“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③并润色加工,是当时传教士译书中所采用的普遍方式。就是享有汉学权威声誉的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和大英圣书公会驻沪代理处期间,有关译书之事请沈毓桂“主其事”。施约瑟的译书工作,先请沈毓桂协助,后另“延华士,译以华文”。花之安的第一本文言译著《马可讲义》,“系王君谦如笔述”,主持广学会时又请顾仲涵为其“记室”。^④林乐知的代笔者“初为吴江沈君毓桂,继为上海蔡君尔康,今为之者范君祎,而任君保罗尤与公同砚最久,历二十余年无间”,^⑤林译书籍大半出自他们手笔;李提摩太以蔡尔康为主要代笔者,他的著名译作《泰西新史揽要》由蔡尔康译作华文。^⑥有人统计,至1919年,各类代笔华人累计达5000余名。^⑦

外人所办的报刊机构,也同样离不开华人的协助。他们创办的第一家华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从发起之初就有华人梁发参加编辑之事。《万国公报》名义上由林乐知主笔,实则由华人沈毓桂和蔡尔康先后主笔。《申报》不仅在华人建议下创办,而且一开始就由华人吴子让任主笔,后来又有蒋芷湘、钱昕伯、黄式权、蔡尔康、袁祖志等任主笔或编辑;还由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等人任业务经理。就是外人所办的西文报刊,也有华人参与其事者。如1845年设立的香港《孖刺报》(China Mail),聘用伍廷芳为译员。1857年开办的香港《德臣报》(Daily Press),曾由华人陈霭亭担任“译著之事”。《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Journal)和《中国政治社会科学

① 《广学会序》,《万国公报》第37次,第14页,1892年2月版。

② 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第21页。

③ 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3年第6卷,第9页。

④ 沈毓桂:《匏庐诗文集》,“吴炳序”,广学会1897年版;《万国公报》,第101次,第10页;第109次,第7页。

⑤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⑥ 参见《翻译西书》,《万国公报》第14次。

⑦ 于醒民:《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页。

评论》(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都由中外教士合编。

有的外人所办报刊,还在资金上吸收华人合股。除《新闻报》、《申报》(晚期)等华文报刊有华人投资之外,《大陆报》(China Press)、《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等西文报刊,亦有华人执掌一部分股权。

至于报馆日常事务的料理,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招揽等事务,各报馆几乎无不雇用华人。戈公振曾概括外人报刊的人员雇用情况说:“当时报馆必延一华人为买办”,担任经营之事;又雇用“卖报之人”和“招揽广告之人”,并在地“兼任访员”。^①

在来华外人的办学活动中,也有一些中国文人参与。华人在外人学校中的工作,一是参与校务工作,二是担任汉语和汉学的教学工作,均处于从属地位,但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由林乐知于1882年创立的上海中西书院,华人沈毓桂不仅参与发起,与林一起“参中西之宜,酌核院章,订厘课则,就法英两租界创立分院者二”,而且担任“掌教与总司院务”^②之职,说服林乐知改变“西教第一”的既定目的,转而确立“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③作为圣约翰大学前身的圣约翰书院,创办之初就由华人颜永京担任院长,负责教务和院务。^④从总体上来说,在教会学校任教、任职的华人占有一定的比例。1925年时,基督教所办大学的教员共计有465人,其中华人181人,^⑤占39%,当然在早期不会有这么大的比例。

来华外人的文化传播机构聘用中国文人为其服务,固然使这些华人沦为他们对华文化侵略的帮手,带有文化买办的性质,但亦使这些华人转化为新式文人,逐渐养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素质。为洋教士主持译书事务和代笔者,逐渐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代翻译家,后来几乎都独立从事过不少西学的译编工作,为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而且,这些华人在代笔译书中,无可避免地成了西学的接受者,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逐渐资产阶级化和科学化,或产生和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或丰富了科学知识。

参与外人报刊事业的华人,不仅成为中国的第一代报人,而且成为中国人自办新式报刊的带头人。创刊于1858年的第一家中国人自办报纸《中外新报》,是由时任外人报刊《孖刺报》译员的伍廷芳创办的。创刊于1864年的第二家华人报刊《华字日报》,是由陈霭亭在任《德臣报》译员时发起的。此二报还与其创办者原先任职的二家外人报刊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合作关系。1874年在香港创刊的《循环日报》,是完全由中国人自行发起主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也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报纸,其发起者和主笔者是王韬、洪干甫、钱昕伯,他们都曾参与过来华外人的译书和办报事业。参与来华外人办学活动的华人,则成为中国第一代新式教育工作者。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人学校的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进入外人学校任教,全新的华人教育工作者队伍逐渐形成,有的担任了外人学校的行政领导和专业骨干。

来华外人文化传播机构大量聘用中国旧式文人,不仅使这些中国文人被纳入新式文化工作者的队伍,而且使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发生变化,逐渐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营垒中分离出来。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85页。关于华人参与外人办报的情况,除参阅戈公振书外,另参阅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

② 沈毓桂:《力辞中西书院掌教暨总司院务启》,《万国公报》第95次。

③ 林乐知:《设立中西书院启》,《万国公报》第657次。

④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10页。

⑤ [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181页。

三、西学传播的内容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

来华外人所传播的西学,门类众多,以中国人为主要传播对象,其影响达于中国的各个阶层。

就外人所译编出版的书籍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宗教传布类;二是自然科学类;三是社会科学类。第一类面向全体中国人,以传布教义为主旨,其主要影响是中国各阶层中造就了一大批教徒,使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多元化。第二类主要面向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新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其作用在于提高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教育的水平,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中国科技人员,提高了一般学生的科技知识水平。第三类主要面向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绅士、学子和商人,使他们通过阅读西学书籍而发生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变化,进而成为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的先行者和核心力量。

从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各种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而且受影响越多者,变革的思想越强烈,态度越激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通过阅读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地书籍而成为第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分别主持译编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著作,在初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通商抚夷”的主张。

在洋务运动时期,恭亲王奕訢、洋务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张之洞等,都多少不同地阅读过中译西书。李鸿章甚至在1889年用培根、达尔文学说考试学生。^①王韬、郑观应、邵作舟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都从传教士及其译著中吸取过不少思想要素。在他们的著作中不难见到叙述自己如何与传教士讨论时政,如何因读其论著受感而写作的情形。

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更是中译西书的虔诚读者和致用者。康有为通过阅读中译西书而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维新领袖,他自述转变过程说:“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口《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光绪八年壬午……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是时绝意试事(即科举),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勉读仰思,日新大精”。^②从而逐渐形成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励行变法维新的思路和决心。后来他所写就的各种变法上书和文献,都贯穿着西学的原理。变法维新的理论家梁启超,不仅广读西书吸取理论营养,而且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把一批自认为优秀的译著推荐给广大的维新人士阅读。康梁等维新人士,还从自己读西书的收益中感悟到自主翻译西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之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③于是从1895年成立强学会起,由维新、改良派和留学人士组建的译书机构纷纷出现,使中国人自主译著西学书籍形成高潮,并超过传教士的译书规模。译书的重点也开始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革命史,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大量的思想源泉。

^① 王韬,《格致课艺》,1897年版。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七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116页。

^③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册,(二),第52页。

外人报刊的中国读者面及其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不同性质的报刊有不同层次的读者,宗教类报刊以各个阶层的教徒为主要发行对象;政治思想类报刊的读者大多系政府官员和具有改良意识的知识阶层;商业色彩较浓的报刊拥有较多的商界读者。综而合之,便形成了一个多层结构的读者群,各自从外人报刊中吸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并指导自己的行为。

在政治思想类报刊中,读者和影响面之广大者莫过于《万国公报》。它以“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①为首项内容,大力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变革史,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此外,它还设立奖金,以改良币制、建筑铁路、扩充邮政、敦睦外交、禁止鸦片等项目为题,开展历时多年的征文,促进了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外交、社会改良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万国公报》以其为洋务派和改良派所好的言论,加之采用赠阅的手段,在中国政界和知识分子中拥有大量的读者。它赠阅的对象包括道台以上的高级文官、尉官以上的高级武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吏、专科以上学校的教授、具有举人资格的候补官吏、各级科举士子、官吏及士大夫的女眷及子女,几乎囊括了整个上层社会。维新运动兴起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以及支持和同情维新的一般人士,都自觉地购阅《万国公报》,从中吸取了许多变法维新的思想。维新派所办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也借鉴了《万国公报》的模式,并经常转载其文章。从而使该报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范文澜所言:“变法成为一个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②

在商业色彩较浓的报刊中,《申报》对中国工商界读者的影响较大。它作为一种外国商人创办的盈利性报纸,力图使自己的风格、立场、内容和言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以期扩大发行量。在版面安排上仿效华人自办报纸的模式;在内容上尽量扩大容纳量;在观点上力图树立一副“公正”面孔,设法兼顾洋人和华人的喜好。如对于外资在华修筑铁路问题,在1876—1877年间,就淞沪铁路事件而发生的中外矛盾,该报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详细论述铁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益之处。1883—1884年间,该报因中法战争再次掀起铁路宣传高潮,进一步讨论中国修筑铁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申报》的这些言论,固然有为列强获取在华筑路权鸣锣开道的一面,但就其理论原理而言,亦不无道理。马克思就曾在分析英国在印度修筑铁路的客观作用时指出:“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③此外,对于中国人认识修筑铁路的重要性也是有帮助的。当时正是洋务派和开明绅商与顽固派和守旧势力展开铁路问题大论战的时期,《申报》的这些言论除了取悦于列强之外,也迎合了洋务派和开明绅商的观点,并为他们的论战提供了某些依据。

《申报》以其工商信息和时事政论并重的内容,使它的读者群从工商界而逐渐普及到士绅阶层。据该报自述,1877年时发行数“已将及万”,然“阅报之人市肆最多”,因为商界人士觉得:“《申报》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浅显,令各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④到1890年时已被文化界人士广为接受,“上海各士绅无不按日买阅”,发行量亦上升到2万份左右。^⑤

致于来华外人所开办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一般是宗教教义、西学和汉学三者兼有;小学和

① 沈毓桂:《兴复万国公报序》,《万国公报》第1次,1889年2月版。

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2—73页。

④ 《论本报销数》,《申报》1877年2月10日。

⑤ 《新闻纸缘始说》,《申报》1890年1月26日。

普通中学,以宗教、中西文化和科学常识的基础教育为主,专科学校和大学则以各种专业教育为主,西学的比例较大。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具有相应的知识层次和结构,尤其是专科学校和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大都成为掌握某种专业知识的新型人才。

1890年之前,毕业生从事于教会工作的较多,或当牧师,或作传教士的助手,或在教会学校教书,或在教会医院任职。1890年之后到民国成立前后,毕业生在教会之外的工商、交通、财政和教育部门任职者逐渐增加。1896年时,上海中西书院的主持者刘乐义说,该校的毕业生遍布于海关和电讯机构,受雇于中外商业机构者也为数不少。1905年前后,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有不少教会学校毕业生受聘为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校任职,教授数学、自然科学和英语等西学课程。^①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其分布面更加扩大。如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在1926年时的职业分布是:政府官员43人,其中内阁部长级7人、局长级16人、外交官6人、铁路官员14人;商业人员158人,其中经理24人、买办107人、银行职员27人;教育工作者72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大学教员65人、中学校长5人。^②燕京大学1917—1936年的历届毕业生共1700人,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占40%;从政者占16%;从事宗教工作的占13%;经商者占8.5%;从事新闻工作的3%。^③再从教会大学全体毕业学生的职业分布状况来看,1932年时累计毕业生总数为7千人左右(不含天主教办的震旦等3所大学),其中40%从事教育、12%经商、10%从事教会活动、7%从政、7%留洋。^④

由上可见,西学传播的内容影响所带来的中国传统人文社会分化,较之前两个方面更为深刻和广泛。它不仅给传统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使中国文化形成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共存的二元结构,而且使接受西学的中国人具有新的素质和扮演新的社会角色,从传统的中国人中分化出来,并使这种分化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

四、中国人对西学的自主选择与西学传播的双重效应

上述三方面以传教士为主要载体的西方对华文化传播,所以会对近代中国的人文社会变化产生一定的客观促进作用,除了其所传播内容中的西方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具有相对的进步性时效性之外,也与基督教传播的本身的资本主义属性和中国人对西学的自主选择相关。

对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主力是基督教,而此时的基督教已是经过改革的新教,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教的活动内容不仅仅限于单一的宗教活动,而是包括文字、教育和科技传授等工作。因此当它进入中国及其他国家之后,开展文字、教育和传播科技活动,不单单是为了给自己的宗教传布打开道路,也是其教会活动的固有内容。就是它所宣扬的禁欲、进取、谦恭、忍耐、刻苦、守职等信念,对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是一个根本的要素。^⑤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它所宣扬的宗教信念,固然有削弱中国教徒反帝斗争的奴化教育一面,但它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因素应是同样存在的。至于

① 参见〔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67、68、469、470页。

② Cressy E. H.: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925—1926*, Shanghai, 1928年,第203页。

③ 《燕大友声》,第2卷,第9期。

④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12页。

⑤ 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译本。

基督教精神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过怎样的作用,虽尚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在现象上并不无表现事例。如近代的不少大资本家,不仅加入了基督教,而且在其创业和守业、持家过程中不无基督教精神的体现。基督教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文化内涵,正是其能逐渐被中国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来华外人对中国的西学传播,除了在内容构成上具有上述两面性之外,其传学的目的也与中国人接受西学的目的不尽一致。来华外人的传播西学,当然是出自其自身和本国的利益,旨在实行对华文化同化,奴化华人,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为其本国的对华政治和经济侵略开道。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西学时,并不是一唯按照外国文化传播者的旨意去做,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动机和标准。加之传华西学的内容构成,并非全属奴化和教化方面,而是包含着许多科学技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以及实用性知识。这就使中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动机和需求标准,去参加外国人的西学传播活动,去仿建自己的西学传播机构,去吸收自己所需的西学素养。

传华西学内容构成的两面性,与中国人接受西学选择动机和标准的多元自主性,不仅将使西学传播的政治结果与外国传播者的目的颇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而且还在政治和职业分野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分化。就西学传播的政治结果而言,大体造成了四种对列强侵华抱有不同态度的中国人。

其一是完全依附于外国侵略者,为列强侵华服务的人。这些人一般较大程度地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还与侵略者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组织关系,这些人与外国文化传播者的目的完全相符,但为数不多。

其二是置身局外,对列强侵华既不参与又不置可否的人。他们大多是虔诚的普通教徒,完全被西教教义所麻醉,又从教会那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资源,使他们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依靠的目的得到较大的满足,因而不再关心世事。教化出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国文化传播者的意图相符,为数最多,但他们多数限于宗教界和社会低层,且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大。

其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他们为了谋生而在列强在华的有关机构中工作,平时不得不为其雇主办事,但内心并未忘却民族利益,当列强有严重的侵华和迫害中国民众行为时,往往能出面批评和反对,或支持和参加社会上的反侵略活动。其中的有些人还能以其所掌握的侵略者内情和西学知识,对列强的侵略行为进行较为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或提出较好的反侵略主张,因而也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已表现出与外国文化传播者用意相异之处。

其四是力求民族自强自立,反对列强侵略的人。这种人包括部分改革派、部分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和大部分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这些人是为了寻求强国救国之理而去接受西学,有强烈的民族感,所以在主张开启国门,通商贸易,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求国家富强的同时,也主张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反对侵略。他们不仅从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反对列强侵略,而且还从传华西学中寻觅反侵略的武器。如林则徐、魏源等所提出和奉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力图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抵抗列强之侵略。洋务派所提出实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纲领,亦有通过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实现中国自强,抵御列强侵略的意图。由梁启超提出,并为维新派广泛认同的“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

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①的思想,则更认为只有学习西学才能使民族获得自强自立,进而具有抵抗列强侵略的能力。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派,从传华的国际法学说、重商主义学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民族独立运动史著作中吸取理论原理,作为反对和抵抗列强侵略的武器,亦是屡见不鲜的。这些人虽然为数不是最多,行为不是最烈,但其社会影响极大,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早期反侵略斗争的理论先导者。至于教会学校的学生,则逐渐成长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锋队,尤其在民国以后,这种作用更显突出。他们的这种以西学为反侵略武器的思想和行为,更大程度地,甚至完全与外国文化传播者的目的相违背。

以上中国西学接受者对列强侵华态度的分野,一方面反映了西学对华传播的双重效应,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人民族主义观念和表现行为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显示了上述四种人与传统民族主义者的不同,而且显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就西学传播促进中国社会的职业和政治分化而言,则有下列几种表现。首先,促进了新阶层和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那些接受西方宗教教义的中国人,大多成为西方宗教的教徒,有的还成为神职人员,使中国的宗教界中产生了新的成份。到1910年时,天主、基督二大教会的华人教徒已发展到178万多人;华人神职人员约达千名左右,^②已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势力。那些在外人文化传播机构中任职的华人,有些成为职业翻译家,有些成为编辑,有些成为记者,使中国的文化社会中增添了新的阶层。那些在外人学校中受过外语或各种专业技能训练的中国人,有些到外国在华洋行中任职,成为新生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有些到海关、电报局、铁路、轮船等新兴行业机关任职,扩大了这些新兴行业华籍职员队伍。

其次,促进了新政治派别的形成。那些为强国救国而去接受西学的人,从其所选取的不同西学理论出发,形成自己的社会改革思路,实施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进而形成各种新的政治派别。诸如早期改革派、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等。他们虽然还多少不同程度保留着旧的思想意识,但已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早期现代化思想和行为取向,已成为与传统政治势力不同的,甚或对立的新派别。

再次,促进新式文化和职业社团的产生。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那些已经接受西学的中国人,为了深入研讨西学原理以指导改革实践进一步扩大西学传播面以“开民智而激民气”,^③纷纷组建各种学会,为数达80个左右。这些学会,或以研讨政治学说为主,或以学习某种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为主,或以移风易俗为主,无论其发起者还是活动内容,都与西学相涉。^④此外,随着因西学传播而产生的社会新职业阶层的壮大,相应的新的职业社团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出现。如买办公会、买办联谊会、买办集益会、报界公会、记者同盟会、报界俱进会,以及由华人教徒组成的各种社团。

总之,西方文化侵略者利用中国人员和其他社会条件,进行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既有奴化教化中国人的反动作用,也有促进中国新式人文社会因素产生发展的积极作用,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由单一的传统因素结构,转向新旧兼有的二元因素结构,并朝着以新因素为主导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化,虽然势必带来新旧因素的分歧和冲突,引起社会的变动,但亦由此推动了社会的新陈代谢和现代化进程。

责任编辑:王 颀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戊戌变法》(史料)第2册,第220页。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38、239、245页。

③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史料),第4册,第147页。

④ 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